

斯大林

论反对派

第七分册

人民出版社

结 论

(12月13日)

一 几点意见

一 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同志们！在谈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请允许我对反对派那些不是歪曲事实就是捏造和诽谤的声明作几点事实上的修正。

(一)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发言问题。反对派声明说，他们之所以决定发言，是因为联共(布)中央没有直接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违背反对派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假如中央禁止他们发言，反对派首领们是不会决定发言的。

其次，反对派声明说，他们在这里，在扩大全会上发言，是要用一切办法不使斗争尖锐化，他们只是作几点一般的“解释”：老天在上，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向党进攻；老天在上，他们丝毫没有打算责备党和控诉党的决定。

同志们，这都是不真实的。这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是反对派阳奉阴违的表现。事实表明，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表明，反对派首领们在扩大全会上的发言并不是“解

释”，而是向党进攻，向党袭击。

公开提出谴责党右倾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向党进攻，这是向党袭击。

难道联共(布)中央在自己的决定中没有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使斗争尖锐化，会激起派别斗争吗？是指出过的。这也就是联共(布)中央对反对派的警告。中央能不能比这再进一步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央不能禁止发言。每个党员都有权向高级机关控诉党的决定。中央不能不重视党员的这种权利。可见联共(布)中央为了防止斗争更加尖锐化，防止派别斗争更加剧烈，是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的。

反对派的首领们既然都是中央委员，那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发言不能不变成对自己党的决定的控诉，对党的进攻，对党的袭击。

这样，反对派的发言，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并不是他个人的发言，而是整个反对派联盟的发言，因为他所宣读的演说词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签了名的，加米涅夫的这次发言是反对派联盟从 1926 年 10 月 16 日提出的放弃派别斗争方法的“声明”发展到重新采用派别斗争方法进行反党斗争的新阶段的转折点。

由此得出结论：反对派违背了他们自己 1926 年 10 月 16 日的“声明”，又采用了派别斗争的方法。

同志们，让我们就这样记下来吧。用不着粉饰。加米涅夫说得对：猫应该叫做猫。（喊声：“对！”“猪应该叫做

猪！”)

(二)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后宣传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倾向的错误策略。”

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至于说到列宁在 1917 年的立场和他的四月提纲⁹⁴（这里所说的正是这一点），那末党知道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同列宁同志站在一道并和当时反对列宁提纲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团作斗争的。读过我党 1917 年四月代表会议记录的人不能不知道，我是和列宁站在一道并和他一起反对加米涅夫反对派的。

这里的魔术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笑声，鼓掌。）

加米涅夫当时站在反对列宁、反对他的提纲、反对党内多数的立场上，并且发挥了近似护国主义的观点，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例如在 3 月间发表了半护国主义性的文章，对这样的文章我当然不能负丝毫责任，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托洛茨基的倒霉就在于他在这里把加米涅夫弄成斯大林了。

托洛茨基当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 1917 年四月代表会议时，当党和加米涅夫集团进行斗争时，他是在哪一个

党里面呢，在左派孟什维克里面呢，还是在右派孟什维克里面？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加入齐美尔瓦尔得左派⁹⁵ 呢？让托洛茨基对我们讲清这一点吧，哪怕在报刊上也好。至于他当时不是我们的党员，这是托洛茨基应该记得的事实。

(三)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在什么情况下犯的，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说出来。

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在民族问题上，我和党或者和列宁从来没有过任何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大概是一件小事，即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责备过我，说我对于穆吉万尼(不久以前做过驻法国的商务代表)这一类格鲁吉亚的半民族主义者、半共产主义者采取了过严的组织政策，说我“迫害”他们。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对待所谓“倾向分子”如穆吉万尼一类人的态度，实际上应比作为我们党中央的书记之一的我所采取的态度更严厉些。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腐化的派别。让托洛茨基证明不是这样的吧。列宁当时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卧病在床，不可能注意这些事件。但是这件小事和斯大林的原则立场能有什么关系呢？分明是托洛茨基挑拨是非地暗示我和党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可是，整个中央委员会，连托洛茨基也在内，一致投票赞成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提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次投票是在穆吉万尼事件以后，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举行的，这难道

不是事实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民族问题报告的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别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民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到底在哪里呢？托洛茨基究竟为什么要提起这件小事呢？

(四)加米涅夫在发言时说，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犯了“向左边开火”即向反对派开火的错误。这样说来，党反对过而且继续在反对党的革命核心。这样说来，我们的反对派是左派而不是右派。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散布的诽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想到向革命的多数开火，而且不能这样做。实际上代表大会是向右派开火，向我们的反对派分子开火，他们是右的反对派，虽然他们披着“左的”外衣。当然，反对派喜欢以“革命的左派”自居。但是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相反地认为，反对派只是用“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实际上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知道，右的反对派常常用“左的”外衣来掩饰自己，以便把工人阶级引入歧途。“工人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右的。现在的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现在的反对派的实践和全部工作都证明他们是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从“工人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到“新反对派”和所有那些苏瓦林分子)的集中点和策源地。

加米涅夫在“左派”和“右派”的问题上犯了“小小”颠倒是非的毛病。

(五)加米涅夫引证了列宁著作中说我们还没有打好我

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那句话，于是宣称党犯了错误，说党好象断言我们已经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了。

同志们，这是胡说。这是加米涅夫的一点小诽谤。党从未宣称过它已经打好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完全不是我们已经打好还是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争论的只是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党肯定说我们有可能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反对派却否认这一点，因而滚到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道路上去了。现在争论的正是这一点。加米涅夫感到自己立场不稳，力图回避这个问题。但他是回避不了的。

加米涅夫又犯了“小小”颠倒是非的毛病。

(六)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他“已先知列宁在 1917 年三四月间的政策”。这样说来，托洛茨基“已先知”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这样说来，托洛茨基还在 1917 年二三月间就已经独自想出列宁同志在 1917 年四五月间的四月提纲中所维护的政策了。

同志们，请允许我说，这是愚蠢而无耻的吹牛。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这种情景真值得一笑。碰到这样事情，农民总说得很对：“以苍蝇比巨人。”(笑声)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让托洛茨基试出头在报刊上证明这一点吧。为什么他连一次也不尝试呢？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那末，1917 年 4 月列宁同志一出现在俄国舞台上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

释呢？“后知者”认为必须和“先知者”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公式“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列宁当时几度声明他和企图跳过农民运动、跳过土地革命的托洛茨基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先见之明”究竟在哪里呢？

结论：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可是反对派喜欢运用捏造和诽谤。

二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我在报告中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流亡国外的俄国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都在称赞反对派。我说过，他们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正在干破坏党的统一也就是干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我作了许多引证，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称赞反对派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反对派进行活动来策动国内反无产阶级的力量，力图破坏我们党的威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信，从而便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事业。

为了回答这一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一样）首先引用了称赞我党和斯大林的西方资本主义报纸的言论，然后引用了赞成我党立场的我国资产阶级专家的代表人物——路标转换派分子⁹⁶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

说到资本家，那末他们对我党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不久以前，资本家在美国报纸上赞扬斯大林，说他使他们

有可能获得很大的承租权。而现在又百般责骂斯大林，硬说斯大林“欺骗了”他们。一个时候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出现了讽刺斯大林的漫画，画着斯大林手里提着一桶水在扑灭革命的火焰。可是后来又出现了跟它相反的讽刺画，画着斯大林手里提着一只桶，但桶里不是水而是煤油，原来斯大林不是在扑灭革命的火焰，而是在火上加油。（鼓掌，笑声。）

可见他们资本家对我党的立场也象对斯大林的立场一样有很大的分歧。

我们来谈一谈乌斯特里雅洛夫的问题。乌斯特里雅洛夫是什么人呢？乌斯特里雅洛夫是资产阶级专家和一般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敌人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阶级敌人，他们不愿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无论如何要推翻它。也有这样一种阶级敌人，他们愿在某种程度上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有一种敌人，他们竭力准备条件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种敌人，他们跟苏维埃政权合作，反对主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希望专政一点点地削弱、蜕化，以至将来能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乌斯特里雅洛夫就是属于后一类的敌人。

加米涅夫为什么要引用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呢？也许是为了表明我党蜕化了，因此乌斯特里雅洛夫也就称赞斯大林，或者称赞我们党吧？看来不是为了这一点，因为加米涅夫不敢直言不讳。那末，加米涅夫究竟为什么在这种场合

要引用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话呢？显然是为了暗示“蜕化”。

但是加米涅夫忘记说，就是这位乌斯特里雅洛夫更加称赞列宁。乌斯特里雅洛夫那篇称赞列宁的文章是我们全党都知道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列宁同志在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蜕化了”，或开始“蜕化”了吧？只要把这个问题一提出，就足以了解这种关于“蜕化”的推测是多么荒谬的了。

这样看来，乌斯特里雅洛夫为什么称赞列宁和我们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加米涅夫千方百计力图回避的问题。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之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勾当。这一点已由引文证明了。乌斯特里雅洛夫称赞我党，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容纳了资产阶级专家，这些专家的帮助和经验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之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以自己的派别活动去帮助他们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而乌斯特里雅洛夫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不了，便抛弃了颠覆苏维埃政权的观点，力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旁边占一席之地，力图沾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至于他们之称赞党，则是因为党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存在，这个新兴资产阶级想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本阶级的目的，而苏维埃政权则利用他们来达到无产

阶级专政的目的。

我国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敌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而乌斯特里雅洛夫这班先生们则称赞我们党，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想请你们注意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列宁说：“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40页）

正因为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参加某种有条件的合作（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并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正因为这一点，乌斯特里雅洛夫才称赞我们党，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并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资产阶级的目的。我们，我们党则有另外的打算：利用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经验和知识，以便使他们一部分人苏维埃化和被同化，而另一部分不能苏维埃化的人则叫他们滚开。

列宁把新兴资产阶级跟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区别开来，容许前者存在并加以利用，而建议逮捕后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同志在其《论粮食税》中写道：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合作社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领教’的结果，只有靠实际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旁边的资产阶级专家做

得更好些，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57页）

关于以乌斯特里雅洛夫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专家，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则讲过下面的话：

“而对于那些实际上不外乎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非党人物’，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遣送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去自由地享受纯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换意见吧。”（同上，第357页）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也许反对派不同意列宁吧？那就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逮捕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而容许新兴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限制下存在，以便用经济手段和他们作斗争，一步步地战胜他们，同时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某些乌斯特里雅洛夫之类的阶级敌人之称赞我党，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资产阶级和现存的苏维埃制度实行某种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合作；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我们的建设，我们在实现这个目的时，大家知道，并不

是没有成绩的。而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类的阶级敌人之称赞反对派，却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在破坏我党的统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推翻专政的勾当。

我希望反对派最后会了解第一类称赞和第二类称赞之间的全部差别。

三 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反对派在这里说到个别中央委员的一些错误。当然，个别的错误是有过的。我们没有绝对“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但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错误，犯者并不坚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政纲和派别。这种错误很快就被忘却。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犯者一直坚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别、政纲和党内斗争。这种错误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

必须把这两种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

例如托洛茨基说，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有一个时候犯过错误。这是确实的。在我们收购机关混乱时期我的确提议过**暂时**开放一个港口来输出谷物。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在和列宁商谈后我立刻就纠正了。至于托洛茨基的这类经中央纠正后不再坚持的错误，我可以举出数十个数百个。如果我列举托洛茨基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但没有坚持而且被忘却的一切极严重的、不大严重的和不严重的错误，那末我得为此做几次专题报告。但是，我认为在政

治斗争中，在政治论战中，应当谈的不是这类错误，而是后来发展成政纲并引起党内斗争的那种错误。

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谈到的问题，恰好是这类没有发展成反对派别而且很快就被忘却的错误。因为反对派谈的正是这些问题，让我在这里也提一下反对派首领们过去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吧。也许这对他们是一个教训，下次他们就不会再想拼命抓住已被忘却的错误了。

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里硬说：苏维埃政权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境地，“布谷鸟已经叫过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即使不是几个星期，也只有几个月了。这是 1921 年的事情。这是最危险的错误，说明托洛茨基具有危险的情绪。但是中央因此嘲笑了他，而托洛茨基也没有坚持自己这个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在 1922 年），托洛茨基提议准许我们的工矿企业和托拉斯把国家财产连固定资本在内抵押给私人资本家，以便获得贷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喊道：“这是投降的道路。”）也许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企业的非国有化的前提。但是中央否定了这个计划，托洛茨基争了一下，可是后来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在 1922 年），托洛茨基提议把我们的工业严格地集中起来，那么狂乱地集中起来，以致必然要把我们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阶级抛出工厂大门。中央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这个烦琐的、狂乱的和政治上危险的提议。托洛茨

基几次向中央提到将来势必走上这条道路。然而我们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有人喊道：“那就非把普梯洛夫工厂关门不可。”)是的，事情是会弄到这个地步的。可是后来托洛茨基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如此等等。

或者我们拿托洛茨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吧，他们常常喜欢提到布哈林有一次说的“发财吧”，并且围着这个“发财吧”手舞足蹈。

还是 1922 年的事情，当时我们正讨论乌尔卡尔特^①的租让和这一租让的极苛刻的条件的问题。结果怎样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建议接受乌尔卡尔特租让的苛刻条件，并且坚持自己的建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中央拒绝租让乌尔卡尔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或者再从加米涅夫的错误中举出一件事实来说吧，本来我是不想说它的，但是加米涅夫使我不得不提到它，因为他令人厌烦地屡次提到布哈林的错误，提到布哈林早已纠正和消灭了的错误。我说的是加米涅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的一件事。在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与西伯利亚阿琴斯克城的巨商合拍了一封贺电给立宪派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喊声：“可耻！”)就是沙皇逊位后授以“即位权”的那位米哈

① 乌尔卡尔特是英国的工业家，他是十月革命前在俄国拥有大量土地、森林和矿产的“俄亚联合公司”的经理。此处乌尔卡尔特即指“俄亚联合公司”。——译者注

依尔·罗曼诺夫。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加米涅夫由于这个错误在 1917 年四月代表会议上受到我们党的严厉斥责。可是，加米涅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要不要提到这类错误呢？当然不要，因为它们已被忘却而且早已消灭了。为什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拿这种错误来指责党内论战的对方呢？他们这样做只能使我们不得不提起反对派首领们的许多错误，这不是很明显吗？即使是为了杜绝反对派的吹毛求疵和恶意诽谤，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但是还有另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为犯者所坚持而且后来发展为派别的政纲。这完全是另一种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揭发这类错误并克服它们。因为克服这类错误是在党内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党内统一、消灭派别活动并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的唯一手段。

例如托洛茨基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错误，就变成了一套完整的反党政纲。应不应该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应该的。

又如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的错误，在我们党内就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论。

又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夜的错误就造成了党在 1917 年十月起义前的危机。

又如反对派联盟目前的错误则形成了派别的政纲和反党的斗争。

如此等等。

是否需要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需要的。

谈到党内意见分歧时能不能对这种错误绝口不谈呢？显然是不能的。

四 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硬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篇人所共知的论文中不正确地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同志们，这是胡说。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是嫁祸于人。实际上只能说季诺维也夫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观。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种说法，其中没有一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两种说法根本互相矛盾。

第一种说法。季诺维也夫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基本领导力量这个正确的论点出发，得出一个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专政**。这样，季诺维也夫就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了。

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在阶级和党之间，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划上等号，这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从来没有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在党和阶级之间有许多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背后则站着无产阶级的全体群众。忽视这些非党的群众组织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视工人阶级全体群